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

长沙与敦煌 千余年前就在“联动”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范盛杰 综合报道

6月30日上午,“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湖南省博物馆策展人此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此次特展称得上是敦煌文物外展展览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本次展览依托数十年“数字敦煌”研究成果,陈列按原比例整窟复制的精美洞窟、壁画临摹品、彩塑临摹品,以及敦煌出土的珍贵文物、文献共计200余件(套),包括24件一级文物,其中还有“敦煌”牍、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和北魏刺绣佛画等国宝级文物。

这三件国宝级文物有什么看头?敦煌文物特展有哪些小意思?看完这些文物后,你又是是否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长沙虽然与敦煌相隔两千七百多公里,但早在特展举办的千余年前,两地的文物就已在“联动”?

“敦煌”牍 在见惯简牍的湖南,它也是特殊的

何为简牍?简牍是中国书法的重要遗迹宝库,长的竹木质薄片称为简,宽大的薄板则叫作牍,也称“方”或“版”。

湖南人对简牍并不陌生,长沙出土简牍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大、序列最完整,总数超10万件,约占全国三分之一,长沙也因此被学界誉为“简牍文化之都”或“中国简牍文化之都”。

但“敦煌”牍与大部分湖南出土的简牍不同——它是木质,而非竹质。事实上,敦煌汉简以木简为主,竹简甚少。敦煌作为汉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门户,作为边塞前沿阵地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大量简牍文书在此产生,记录了当时的行政、军事、经济等活动。

当然,湖南出土的简牍也并非没有木质质地。例如走马楼吴简大木简,它于1996年在长沙市走马楼22号古井中发现,为杉木质,是一种破崩保据的券书,所记为嘉禾四年、五年租佃田地、收取租税事;又如著名的里耶秦简,它出土于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材质为水松、油杉、杉木等,是秦王朝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法律、文化、邮传、地理等领域。

说回“敦煌”牍。这枚汉简长9.2厘米、宽3.2厘米,是专家于1981年在汉长城千秋燧采集到的,因其上以汉隶书写“敦煌”两字,得名“敦煌牍”。

何为敦煌?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敦煌”一词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的译音,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王宗维、李正宇则认为“敦煌”与“敦薨”互通,“敦薨人”最早在罗布泊活动,其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史籍中“敦煌”一词,则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的记载,应劭解释“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即取盛大辉煌之意。

“敦煌”牍因为带有“敦煌”字样,直接印证了汉代对敦煌地区的管辖,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此外,汉代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时期,敦煌汉简中的隶书保留了隶变(篆书向隶书演变)的完整过程,从早期的“古隶”到成熟的“八分书”(汉隶),清晰展现了汉字书写从繁复到简捷的演变轨迹。“敦煌”牍中的“敦煌”二字,是典型的汉代隶书。作为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它是研究汉代历史、文化及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
莫高窟的创建年代的锚点

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又称“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立于莫高窟第332窟,两面镌字。

莫高窟第332窟建于武则天时期,主室前部人字披顶,后部中心塔柱。塔柱南北西三面都不开龕,南面画卢舍那佛一铺,西面画药师佛一铺,北面画灵鹫山说法图一铺。南北壁前部壁前,塔柱东向面壁前各塑一佛二菩萨立像。南壁后部画涅槃经变,西壁开龕,塑涅槃像,北壁后部画维摩诘经变。东壁门南画一佛五十菩萨图,门北画灵鹫山说法图一铺。而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就立于石窟前室,先叙述此窟创建年代及武周时盛况,次叙陇右李氏源流及李克让修今322窟之功德。

李唐一统天下,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不仅国内东南西北的学术文化汇集,而且中西文化以及胡汉文化兼容并蓄,于是,佛教天南海北的各宗派的思想在交流中汲取他家之长而发展,其宗派特色较前更鲜明,如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特别是禅宗。唐朝开国的几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佛教,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而武则天的崇佛,更大大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敦煌留下了不少这一时期的洞窟,332窟则是少数有纪年的洞窟,十分珍贵。

此碑为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立,故又称“圣历碑”,距今已有1300余年,是敦煌现存最早的一块石碑,敦煌莫高窟的创建年代,就是根据此碑确定的。碑云:“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僊,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龕……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龕,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又云此窟建在其父窟侧,一般认为其父所建之窟是今331窟。

1921年,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被白俄军队折断,现仅存残碑一段。不幸中的万幸是,此前有金石学家徐松等人制作了拓片,人们才得以看到完整的碑文。

北魏刺绣佛画
已知最早的佛教刺绣作品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刺绣佛画是国家一级文物,属寺院供奉物。它现藏于敦煌研究院,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满地绣佛像之一,也是已知最早的佛教刺绣作品之一,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一杂项类。

它并非出土于窟内,而是1965年敦煌莫高窟第125窟至第126窟之间裂缝中发现。纵49厘米,横29.5厘米。刺绣佛画残损较重,残存部分可见主尊为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着红色袈裟,跏趺,有胁侍菩萨,跏趺而立。佛座下方有发愿文,共14行,行11字,现存半数,有“……和十年四月八日直广阳王慧安造”。发愿文两侧为供养人,右侧第一身为前导比丘,第二身为男供养人,存题记“……王”。

佛画左侧有5身供养人。第一身为前导比丘尼,题记“师法智”;第二身戴高冠,着窄袖对襟长衫,题记“广阳王母”;第三、四、五身形像同第一身,题记“妻普贤”“息女僧暘”“息女灯明”。横幅花边由联珠龟背纹与圆纹叠套组成主体纹样,空隙内填饰忍冬,四周空处饰以花苞和鱼纹。

四月八日为佛诞节,这件刺绣属于信徒向寺院供奉之物。发愿文题“广阳王慧安”之名不见史书,可能慧安是广阳王元嘉的佛教名字。史书记载,元嘉以侯佛著称。元嘉造刺绣佛像,本人以及妻女的名字都是佛家的“法名”。



▲凤纹砖与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纹执壶。组图记者范盛杰

从莫高窟 到长沙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箎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 etc 文物5万余件。这些后来被称作“敦煌遗书”的珍宝,如今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并催生出“敦煌学”。

其中,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P.3619写本中,留有佚诗《秋夜泊江渚》。诗首句“我有方寸心”,同样出现在长沙窑的诗文瓷壶之上。

这样的诗韵呼应并非孤例。一件长沙博物馆藏长沙窑“白玉非为宝”诗文瓷壶,壶身题着“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而敦煌写本P.2622《吉凶书仪》中,也有“白玉非为宝,黄金我未虽(须)。(写)竟千(张)数,心存万卷书”的表述。

长沙与敦煌之间的“联动”,早在千余年前就开始了。

长沙窑始于东汉晚期,创烧于唐代初年。安史之乱导致北方窑工南迁,带来了北方陶瓷工艺,与本地技术结合,催生了釉下彩瓷,开启了长沙窑的黄金时期。长沙窑于公元8世纪中叶进入快速发展期,9世纪初达到生产巅峰,形成了与越窑、邢窑“三分天下”的外销瓷格局。

作为唐代丝绸之路对外商业交流的重要货物,长沙窑瓷器从湘江出发,远销海外。长沙窑也是唐代开放包容、积极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其生产的瓷器装饰纹样融合中外文化元素,既包含中国传统的龙、凤、花鸟等图案,也大量采用为适应海外市场而定制的西亚、中亚风格纹饰,如椰枣纹、摩羯鱼纹以及阿拉伯文字等。

此次特展中,不仅展出了来自敦煌的文物,还有出土自湖南的长沙窑瓷器青釉褐绿彩凤纹执壶、青釉褐斑模印贴花龙纹壶等。龙纹、凤纹、莲花纹、胡人乐舞形象……两地相隔超过5000里,却意外在出土文物的纹饰图案上达成了共鸣。

除了长沙窑瓷器,特展上还展出了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唐代宝相花纹菱花镜,其旁边展示的就是敦煌莫高窟第98窟窟前遗址出土的宝相花纹砖。两件小小的文物,印证着文化的交流互鉴。而正是不同文化的交融,处在东西交通咽喉的敦煌,才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湖南省博物馆藏彩绘双髻女俑与莫高窟第130窟复制壁画都督夫人礼佛图。▲都督夫人礼佛图细节。



▲▲莫高窟第112窟壁画临摹品反弹琵琶舞乐图中的舞伎与长沙窑青釉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中的胡人舞者。



▲▲1964年出土于莫高窟第467窟前的蹲狮砖与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壶的蹲狮形象。



▲▲敦煌莫高窟第98窟窟前遗址出土的宝相花纹砖与湖南省博物馆藏宝相花纹菱花镜。



▲“我有方寸心”诗文瓷壶,长沙博物馆藏。图/长沙博物馆